

# 上古史探研

沈长云 著



中华书局

# 上古史探研

沈长云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古史探研/沈长云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2

ISBN 7-101-03695-3

I. 上… II. 沈… III. 中国-上古史-文集

IV. K2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5895 号

责任编辑 李解民

**上古史探研**

沈长云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3<sup>5</sup>/<sub>8</sub> 印张·333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3.00 元

---

ISBN 7-101-03695-3/K·1555



## 自序

我自1979年考取著名先秦史专家赵光贤先生的研究生而学做先秦史研究以来，迄今共发表了约80篇论文。这本集子，便是从这80篇论文中选取出来的。其中有长篇，也有短论，但更多的是一些读书札记性质的东西。题名《上古史探研》，“上古”即先秦的换一种说法。非敢自矜，不过拿它向学界同行更好地做些交流而已。

先秦史研究是人们耕耘已久的园地。之所以居然还能在上面耕耘出一些东西，一是靠了地下不断出土的考古资料，特别是古文字资料；再则是靠了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由于个人一直从事教学工作，结合教学做研究，主要是为了把一些与教学内容有关的问题搞清楚，这决定了我所研究的范围和题目十分分散。另外，学校资料来源有限，我所使用的材料往往是人家使用过的，许多情况下，所谓研究属于另辟蹊径，捡拾剩义，或者干脆就是纠正人家一些错误说法。这种做学问的方法自然辛苦，但却更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如果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那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这当然不是刻意求新，而是发现学术领域确实有些问题亟需解决。例如，根据流行的教科书的说法，中国古代，主要是夏商周三代，存在过所谓奴隶社会，这之中就有不少问题。又如上古中国国家的产生及其模式，许多人将其说得跟古希腊罗马国家无有二致，看来也值得研究。近来学术界很热闹的夏文化讨论，不少学者把注意力集中于豫西晋南，这与文献所见夏后氏多活动于东方的记载亦不甚相符。还有一些文章对甲骨文金文的释读与商周社会的实际有所出入。凡此问题，都需要通过深入细致



的研究才能解决。作为史学工作者，弄清楚这些问题，也算是自己“求道”精神的一种体现吧。

为清眉目，集子所收论文划分为“夏商史探研”、“西周史探研”、“春秋战国史探研”和“上古史理论问题探研”四个部分。但这不是说前三个部分不涉及理论问题，而是说第四个部分讲理论问题多些，且带有对各个时期有关内容进行综合的性质。几个部分中，以讲西周史的篇目为多。这也是继承了我的导师赵先生的传统，他尤以研究西周社会史而著称。文章中个别地方的论证今或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总体上与我目前所持论点无大差异，故一仍其旧。有道诸君幸垂教焉。

沈长云 二〇〇二年五月于河北师大寓所



## 目 录

自序 .....	( 1 )
----------	-------

## 夏商史探研

论禹治洪水真相兼论夏史研究诸问题 .....	( 1 )
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 .....	( 15 )
禹都阳城即濮阳说 .....	( 34 )
殷契“王作三师”解 .....	( 49 )
说殷墟卜辞中的“王族” .....	( 64 )
说殷周古文字中的杞 .....	( 75 )
——兼说夏后氏后裔的迁播	

## 西周史探研

论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 .....	( 83 )
——为王国维诞辰 120 周年及逝世 70 周年而作	
周人北来说 .....	( 110 )
“邑姜”、“大姜”辨 .....	( 117 )
——周武王后妃称谓释疑	
说《逸周书·度邑》“有夏之居”非夏后氏之居 .....	( 121 )
论成康时代和成康时期的铜器铭刻 .....	( 127 )



说燕国的分封在康王之世·····	(142)
——兼说铭有“匡侯”的周初青铜器	
新出叔天方鼎铭文中天字的释读问题·····	(156)
《俎侯天簋》铭文与相关历史问题的重新考察·····	(162)
《史记·楚世家》记楚熊绎受封时间之误·····	(171)
谈《令簋》中的楚及相关诸问题·····	(175)
关于西周铜器中弧壁方彝的断代问题·····	(188)
西周二韩国地望考·····	(193)
金文所见西周王室经济·····	(200)
琯生簋铭“仆墉土田”新释·····	(210)
释《大盂鼎》铭“人鬲自取至于庶人”·····	(219)
由《诗·七月》论及西周庶人的社会身份·····	(232)
《书·牧誓》“友邦冢君”释义·····	(239)
——兼说西周宗法社会中的善兄弟原则	
周代司徒之职辨非·····	(246)
谈古官司空之职·····	(257)
——兼说《考工记》的内容及作成时代	
郑桓公未死幽王之难考·····	(267)

## 春秋战国史探研

2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日食及相关历史问题辨析·····	(272)
骊戎考·····	(287)
从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论及战国时期的爰田制·····	(297)
赵北长城西段与秦始皇长城·····	(311)
《国语》编撰考·····	(325)



## 上古史理论问题探研

- 认清中国古代非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特色…………… (339)
- 古代中国政治组织的产生及其模式…………… (343)
-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几个问题…………… (357)
- 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 (375)
- 中国古代没有奴隶社会  
——对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反思…………… (396)
- 中国古代奴隶制是发达的奴隶制形态吗  
——和田昌五先生商榷…………… (411)





## 论禹治洪水真相兼论夏史研究诸问题

目前先秦史学界及考古学界对夏文化的讨论很热烈，但有一个问题让人不得其解，就是对于大禹治水的事不怎么涉及。我们过去讲夏史，总是从大禹治水开始的，少了它，就很难把夏史讲清楚。现在讨论夏文化，避而不谈这个问题，我以为也同样难于把夏文化弄清楚。大禹治水故事不仅牵涉到古代洪水事实的有无，而且牵涉到夏后氏渊源和夏文化分布、夏代物质文明和国家产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不可不花气力弄清楚。故不惮其繁，作如下考辨，以就教于研究夏代历史的学者。

### 一 论禹治洪水为信史并论洪水发生的地域

从前的文献，讲洪水为《创世纪》所描述的那种泛滥成灾的洪水，讲禹治洪水为在整个九州土地上的“导江”、“导河”，讲长江、黄河的各处险要为禹开凿水道留下的遗迹（即所谓“禹迹”）。这类洪水故事属于神话是没有疑义的。过去疑古学派对这类神话进行分析，指出不能把它们当作实实在在的史实看待也是对的。但是即如顾颉刚先生那样的以怀疑旧史著称的学者，也相信洪水传说有其产生的背景，或某种现实的依据。他认为禹治洪水与南方土地卑湿所造成的积水泛滥有关，<sup>①</sup>这与今日某些学者根本否认洪水故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sup>①</sup> 顾氏一度认为禹为南方氏族神话中人物，见其《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载《古史辨》第一册。



我们认为，历史上，当夏代或夏代以前，我国中原大地上确实发生过不止一次的洪水，殷墟甲骨文字便可提供这方面的证明。我们发明文字的祖先把昔日的“昔”字写作𠄎，作会意结构，意谓洪水之日；又把火灾的“灾”字写作𠄎，像川水被壅为害。这些都说明商代以前是发生过洪水的，且深深地留在了当时人们的记忆中。

说夏代或夏代以前有过这样一场洪水，还有气候条件的变迁为佐证。据竺可桢考证，在距今 5000 年至 3000 年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气温较现在高约 2℃ 左右。<sup>①</sup> 由气候的变暖导致雨量的增加，使得某些地区易于发生洪水。可以通过比较得出，这段温暖期适当夏朝及其前后。

关键是洪水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认为，这样一场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洪水必是发生在当时居民比较稠密，因而给人们带来较大威胁的地方。这个地方应该就在中原一带。上言商人对此次洪水记忆犹新也体现出这个意思，因为商人的祖先正是生活在黄河下游一带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赞成有些学者把洪水发生的地域指为江南（如吴越、江汉、江淮一带）的说法，因为当时那一带除少数几个点外，大多是些蛮荒之地。然而中原一带是具有很大范围的，不可能到处都有洪水。我们认为古代洪水只是发生在河、济之间，即《禹贡》十三州的兖州及其附近地区。因为兖州以西，自今河南中部起，就入于豫西山地；西北，过太行山脉，便入于晋东南山地。这些地方都属于我国的二级台地，既不会有河水泛滥，也因其雨量的稀少，不致造成大的洪涝灾害。即令夏季山洪暴发，也不过使山谷局部地区受到威胁，与大片土地上持续的洪涝灾害不是一事。兖州以东，入于山东丘陵，也不会

①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温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 年第 2 期。



有洪涝灾害。至于兖州东北的黄河下游，自大陆泽以下，河分九派，一片泽国，已是无人居住的地区，更谈不上什么灾害问题。只有这兖州地区，处在东西两个高地之间，地势低洼，降雨量又较西部黄土高原丰富，最易受到水潦的袭击。加上这里大小河流纵横，首先有河、济二水绕成夹角流经兖州地区，河、济之间又有一条濮水（即《诗经》所谓“桑间濮上”之濮），此外还有濳、沮一类小的河流，一旦发起洪水来，百川之水便先自溢出。故而古代河患的记录几乎全是在这一地区。总之，论古代洪水发生的地域，唯有此处最有可能。

除以上地理形势的分析外，古代文献亦留下兖州与禹时洪水相关的记录。现代专门研究传说时代的徐旭生先生指出，在我国最早的地理专书《禹贡》中，唯有兖州条下的文字有两处专门讲到洪水之事：一处说“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明确讲洪水平治之后，原来宜桑的土地又可以养蚕，人民从高地下来，住到了平地上，非禹治洪水后的情形而何？另一处讲“作十有三载”，正与传说中的“禹湮洪水十三年”相呼应。因而他的结论是“洪水发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sup>①</sup>这个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洪水发生的地域在今山西西南部的汾浍流域，理由是这一带靠近河水的地方存在有不少沮洳，它们应是古代洪水的遗留。另外，这里是传说中的“夏墟”，又有尧、舜、禹在此建都的传说，这正好与夏族祖先鲧、禹在此施工相互合拍。<sup>②</sup>我们认为，汾浍下游的沮洳是否与古代洪水有关，目前还难下断语；像临汾、运城等地的河谷盆地，是由远古断层陷落而

①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三章《洪水解》，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 马宗申《关于我国古代洪水和大禹治水的探讨》，《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形成的，地势较窄，似乎难以造成汗漫无际的洪水景象。从文献记载看来，晋南一带并未发生过大的洪水，那里的降水量偏少，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至于把这地方说成是尧、舜、禹活动的中心，这只是晚起的说法。对此，徐旭生先生也有过仔细的考察，他说：“后人多信尧、舜、禹均建都于今山西省的西南境，但西汉人尚无此说……说尧、舜、禹在这一带建都，大约最先是皇甫谧这样说。”<sup>①</sup>使读者最感困惑的是这个地方具有的“夏墟”的称呼，早在《左传》中就已是这样称呼唐叔受封的晋西南地区了。然而我们的考证表明，所谓“夏墟”并非夏后氏之墟，乃是世居晋南的西夏（或称大夏）族人的故墟，他们属于“戎人”，与居住在东方的夏后氏不是一事。<sup>②</sup>如是，所谓禹施工在晋南的说法全属误会。

事实上，无论是尧、舜，还是鲧、禹，他们的居住范围都在河、济地区，或在其附近。尧、舜的居处和葬地，已有前人解说，不赘。此稍微详细地谈谈禹居阳城及鲧、禹族居地崇山的地望问题。

查“禹居阳城”的说法，最早见于《竹书纪年》。这个记载又与《孟子》“禹避商均阳城”的说法有些相近。但无论《孟子》，抑或《纪年》，对阳城的地望都无解说。在这稍后的《世本》乃云“禹居阳城，在大梁之南”，这可以说是有关阳城的最早的解说。据此，可知阳城在今河南开封以南，与日后夏杼的居地老丘正相邻近。但今天的学者对《世本》的这条记载多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句中的“在大梁之南”几个字为宋衷的注语。我们说，即令如此，也应是宋衷所引用的先秦古籍中的话语。因为大梁是秦以前的地名，汉以后就改名浚仪了。所以就连以后皇甫

①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141页。

② 拙著《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



谧这样的学者对阳城在大梁以南的说法也是相信的，其《帝王世纪》中的“禹避商均浚仪”，无疑便是据《世本》而言的。查开封以南有古城名“启封”，始建于春秋之世，至今有城墙遗迹留存，附近并有新石器时代遗物出土。启封者，启之封疆也，这座古城的得名，显然与禹居阳城有关。战国时期，启封作为魏都大梁南面的屏障，曾在军事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疑所谓“阳城”的名义，就是指大梁以南（在南曰阳）的意思。

至于崇山的地望，今人多据韦昭《国语注》指为河南中部的嵩高山，即今之嵩山，因为嵩山脚下有一座颍川阳城，似乎可以和嵩山相互印证应为夏后氏的居地。然而嵩高山的嵩字虽可与崇山的地名发生联系，但“嵩高”的得名却始于汉武帝（见《汉书·郊祀志》等），先秦时代的嵩山称为太室山，或外方山，因而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论者忽略了司马相如《大人赋》中早已提到的作为尧之葬地的崇山，此崇山，《墨子·节葬下》称之为蛩山，《山海经·海外南经》称之为“狄山”，可见其得名甚早。它的地望乃在古瓠子河流经的汉济阴郡成阳县西北（今山东菏泽北），正在兖州刺史部管辖之内。其距大梁以南的阳城亦不算太远，显然就是作为有崇氏根据地的崇山。

有关禹都阳城和崇山的地望在古兖州的根据，还可以找到一些，限于篇幅，就不赘述了。这项考证，与过去王国维提到的“夏自太康迄于后桀，其都邑及它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殷周制度论》）的结论正前后相应，因此我们相信它是站得住脚的。如将我们考证的夏后氏居地与上面提到的洪水发生的地域相互合观，不难发现这二者之间是互相吻合的。由此亦透露出禹治洪水故事的某些真实性。



## 二 论禹治水对中华文明进程的影响

大禹因治水成功获得各氏族部落的拥护，不久以后，大家选他做了继尧、舜之后的虞、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再不久，当禹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启又因了禹的功烈，建立起夏后氏族的“家天下”，即后人所称的“夏王朝”。这是《尚书》和《史记》记叙的禹治水以后的历史，也是目前多数人们接受的史观。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史观的话，按照逻辑，自然要得出禹的治水对于中华文明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结论：大禹治水促进了我国第一个作为政治组织的王朝的建立，也就是促进了我国文明社会的产生，至少它作为一种象征或标志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的。

然而我们的论者一方面在那里讲述禹和他的儿子如何地建立了夏王朝，另一方面却对禹治洪水的事情不那么认真涉及。即使过去的教科书，对禹治水意义的估计也是不足的。这就有必要也在这方面下功夫作些分析。这样做，也可以加深对洪水真相的认识。

首先，我们从对物质文明的影响来看这个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又得从洪水的性质和禹治水的方法说起。

关于这场洪水的性质，古今也有许多不同说法。实际上，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文献，就可知这场洪水的起因不过是由于雨水的大量增加，导致这一地区大小河流水势的上涨；同时这里低洼的地势，又使连绵不断淫雨所造成的积水无法排泄出去，因而它是一场典型的洪涝灾害。文献如《墨子·三辩》引《夏书》曰“禹七年水”，《荀子·富国》言“禹十年水”，《庄子·秋水》言“禹之时，十年九潦”，《淮南子·齐俗训》言“禹之时，天下大雨”，都是讲的这样一种性质的水潦。我们近年在河南、安徽看到的洪潦灾害实际上也和那时的情景差不多，只不过彼时水潦发生得更加



频繁罢了。对于这种水潦的治理，大约涉及不到对大江大河施行大的手术，所以有人把禹治水解释为治理黄河，看来是不能成立的。

今天多数学者都认为禹治洪水采取的是疏导，这是不错的。然而是怎样一种疏导？是疏导黄河，或者如孟子所谓的“疏九河，濬济、漯”，“决汝、汉，排淮、泗”？以当时使用木石工具的条件，显然不可能。这种“导江”、“导河”的说法，正是当年疑古学派重点批驳的对象。愚意禹的疏导不过是疏导积水而已。对于像豫东那样广平而低下的平原地区发生的水潦灾害，疏导那里大片滞积的洪水，使之及早排出，实为治理工作的头等要务。这也是我们在近年洪潦灾害中所体会到的。而要疏导积水，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开挖沟洫，所以后来孔子论大禹的功绩，十分恰当地把他的治水说成是“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学者论我国最早产生的沟洫都是为着排水的目的，如此正与大禹开挖沟洫的目的合拍。想那时利用骨制的或石制的耜在黄土冲积平原上开挖这类沟洫并非不可为的事，因而我们相信孔子的说法。只是后人为了张扬禹的神力，才把开掘沟洫夸大成开掘诸条江河。

那么，禹在当时采取的那样一种治理水潦的方法又怎样和物质文明的进程联系在一起呢？这还得再对我国农业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作一番简单的追溯。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农业的起源地之一，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先民们就培育出了世界最早的粟和水稻。但是，我国农业的发展，却经历着十分艰辛的道路，这是因为我国自然环境，包括地形与气候条件十分复杂。我们的国土上虽然也有长江黄河这样的大河，但它们并不像古代两河流域和尼罗河那样很早就给人们带来灌溉之利，相反，却因为它们的喜怒无常，使得人们对它们常抱着戒惧心理。以黄河流域而论，虽然先民们为着取水的需要不得不找些靠近水源的地方住下，但对平原低地大河流经的地



区，早先却是绝不敢问津的。他们多选择山麓和丘陵靠着大河支流的地方，如渭河、汾河、洛河、泾河等河流的台地上，此外也选择在太行山各处流泉出山口的冲积扇上作为定居地。像著名的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及仰韶文化的绝大多数遗址，都属这种性质。学者们对我国原始居民从事的农业归类，称之为“山地农业”。

然而所谓“山地农业”受水害的危险虽可免除，其得河水灌溉之利却属不易，他们基本上就是靠老天降下的一点雨水维持作物生长的需要，可是上述黄土高原地带的降水量却偏偏少得可怜。加上先民们耕作技术的原始，收获量自然十分有限。这就促使山地农业向更加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平原多水地区转移。我们打开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迹分布图，即可看到那上面标志的年代较早的仰韶文化遗址基本不出今日京广线以西的山区，东部山东丘陵亦有年代较早的大汶口文化，而广大豫东平原分布的，则几乎唯有晚起的龙山文化遗址。这岂非表明，从事山地农业的人们对于豫东平原的开发，就始于龙山时代开始之际。

我们设想先民们刚下到这片处女地进行开发之时，气候尚相对地干燥，人们没有遇到很大麻烦，由是四方氏族纷纷迁往这温柔富贵之乡。但是，要使这里的文明保持并发扬下去，使这里的人们能够长期立足，总得从根本上消除这里的水患威胁，如果没有一套有效地防止洪水的措施，这柄悬在人们头上的利剑迟早要降临到头上的。尧、舜、禹时期碰到的那场洪水，或许是前此所发生的洪水中最大且距文明时代最近的一次。由此来论禹治水的意义，自然要把解决低地农业的生存和发展放在首位。这个问题的解决，自然也就成了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从史实上看，自从禹治理好了这一带的洪水后，河、济之间乃至整个豫东平原就因文明的继续发展成了夏商周三代人口最繁





庶，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夏商二代立国的基础，或者说他们的王畿，便主要在这一带。前言王国维已指出夏自太康迄于后桀凡数百年间与商人错居于河济之间。商朝建立后，虽“不常厥邑”，然其所都之亳、隰、相、奄、邢、殷等，亦不出这片王畿，或在其周围。即如盘庚以后二百七十三年，虽固定都邑在太行山下的洹水之上，而其诸王往来行幸之地，率以东南地域为主。至于西周、春秋，我们看《诗经》所采的十二国风，竟有近一半的土风来自这一地区。直至战国、秦、汉，兖州一带的富庶仍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孔子过卫，曾为之发出过“庶矣哉”的感叹。应当说，所有上述文明的表象，都是建立在禹以后这一地区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当然，禹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并不止是表现在保障农田的不被水淹上，由于治水而兴建的一套排水系统又可兼作灌溉系统，因而在这个基础上，又很自然地发展起沟洫农业。学者间或以为后世文献记载的井田，便是禹发明的沟洫农业的遗制，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看商代甲骨文中的田字写作田、囿、囿等形，无疑便是原野中经过疆理的有着沟洫或道路纵横其间的早期井田的形象。井田后来发展到全国很多地区，春秋时的文献称它作“衍沃”（《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明它是很肥沃的。可以认为，它反映了三代农业生产的最高水平。以此，人们把发明沟洫农业的大禹看作是三代农业文明的象征，也是顺理成章的。

谈到禹治水与夏后氏国家产生的关系，我们想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考虑的：

第一，国家组织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夏王朝作为我国出现的第一个国家，它必然产生在我国文明发祥最为充分的地区。因而从为夏后氏国家奠定物质基础的角度讲，大禹治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

第二，经典作家曾经指出，东方国家的政治组织往往是由对